

一個旅英臺灣女性的婚姻移民生命故事 探究與啟示

林文川* 吳麗君**

本研究探討因婚姻而移民英國的臺灣女性（希羽）之生命故事，並藉由她在英國掙扎、奮鬥的生命故事來協助我們看見婚姻移民女性在臺灣可能面臨的困境。研究結果發現，生命故事探究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者與參與研究者雙贏的事業，生命故事的深耕也可以成就認知面向並豐富自我。藉著希羽生命故事的啟示，協助我們從跨文化的參照觀點，省思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臺灣外籍新娘文化衝突與適應等議題。本研究以生命故事聯結個別與其它層級間的探究，時間上跨越現在與過去，所展現的生命張力讓教育研究呈現貼近生活的新風貌。研究結果能提供臺灣社會省思婚姻移民女性的處境，並反映多元文化教育議題。

關鍵字：婚姻移民、生命故事、多元文化教育

* 作者現職：文藻外語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 作者現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通訊作者：林文川，e-mail: 97072@mail.wzu.edu.tw

壹、緒論

一、緣起

近年來，臺灣逐年增加的新移民女性，或俗稱為「外籍新娘」、「外籍配偶」¹，已為臺灣社會婚姻結構帶來改變。諸多研究顯示，伴隨著跨國婚姻而來的是逐漸浮現的新移民女性文化適應、或子女教育適應等困境（如王宏仁，2001；夏曉鶯，2000，2002，2005；溫明麗，2006）。這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已經引起政府與學界高度的關切。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全臺灣外籍配偶總人數從 2004 年底的 33 萬 6 千人（張鈿富，2006），至 2007 年底已經增加到 39 萬 9 千多人（內政部統計處，2008）。2010 年上半年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新娘人數有 8,622 人，其中以大陸港澳地區最多、越南籍次之、印尼籍第三（內政部統計處，2010）。這些簡單的數字背後，卻蘊含著一段段豐富的移民故事。然而，反觀臺灣女性也有許多人因不同的原因走上跨國婚姻之路，並與外籍夫婿移民國外，例如美國、加拿大或英國等英語系國家。令人好奇的是，這些臺灣女兒是否也面臨上述新移民女性文化適應、認同、或子女教育適應等問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借用了 Mills 的智慧，從不同情境下以對照的方式來省思觀察這個社會現象。Mills 強調對任何社會學的問題所能提出的答案或說明，常是藉由比較而得來，因此要瞭解對象的基本情境就需要從事比較，他說「對於感興趣的事物，我們必須在不同的情境下加以觀察，否則我們所能做的將不外乎是無聊的敘述」（張君玖、劉鈐佑譯，1995，頁 201-202）。Mills 主張的「觀察」「比較」，可以引導我們反思從移民女性在不同社會脈絡下所活出的命運，也可以看到不同社會結構下的歷史類型。因為，誠如 Mills 指出：「命運不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命運也不是歷史或人性的內在本質，命運是社會結構的某種歷史類型」（張君玖、劉鈐佑譯，1995，頁 243）。從臺灣的女兒遠嫁國外後的生命故事，能幫助我們看見該國社會結構下的歷史類型，而瞭解臺灣本地新移民女性的生命故事，也能協助我們看見臺灣社會結構下當前的歷史類型。透過觀察與比較，我們是否因而可以更深刻地省思婚姻移民生命故事所呈現的社會面貌呢？

本文的焦點是黃希羽（匿名），一位臺灣的女兒因婚姻而成為英國的新移民。希羽婚姻移民故事背後的歷史類型，整體而言可說是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使得近年來跨國婚姻與日俱增（Merali, 2008）。而臺灣人前往英國，無論留、遊學、或因工作、通婚而長期居留英國的人數也有增加的趨勢。例如，近年來

¹ 作者理解「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並非這群新移民女性朋友所喜愛的稱呼，惟這些用語目前仍流行於臺灣坊間。

臺灣學生就讀正規英國學校及短期赴英進修者，總數約15,000人，約佔整體出國留學人數25%，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之臺灣第二大留學目的國（教育部，2013）。就官方婚姻移民數據而言，英國內政部的研究顯示，截至2006年止英國國內有62,732人透過與英國公民結婚而取得居留權（Achato, Eaton, & Jones, 2013），其中主要以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佔多數。臺灣婚姻移民英國屬相對少數，因此無法從官方數據中得知具體數據。這些婚姻移民的類型多樣，有些是亞洲、或臺灣女性喜愛西方男性（尤其是白種男性）的魅力（attraction）而追求婚嫁白種男性的築夢歷程（如，Kim, 2011）。而對故事主角希羽而言，則是在自然情境下認識了來臺旅遊的未來英國夫婿。兩人在臺灣結婚，並於數年後舉家返英定居。踏上婚姻移民之路才是希羽面臨挑戰的開始，在女兒離鄉（臺灣）與媳婦返鄉（英國）路上，希羽婚姻移民的生命故事讓我們看見跨國婚姻女性移民在臺灣女兒與英國媳婦、妻子、母親多重身分認同、以及文化衝突。同時，在希羽主體與客觀社會互動中，也呈現了新移民女性文化適應、認同或子女教育適應等議題，值得我們加以探究。

希羽的生命故事與近年來逐漸浮現的臺灣新移民女性文化適應、子女教育適應等困境，有極為相似的表象。然而，我們清楚英國婚姻移民的女性無論在文化、語言、社會情境脈絡等方面均與臺灣「新移民」女性截然不同，因此貿然進行直接比較並不妥適。但是，誠如 Delamont 和 Atkinson (1995) 所言，「人類學的陌生」（making the familiar strange）有助於研究者以新的角度，挑戰自己將熟悉文化領域中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的慣性思維。因此，探究旅英臺灣女性婚姻故事有益於我們用「人類學的陌生」視野，挑戰我們對嫁入臺灣媳婦的遭遇經常視為「理所當然」的潛在心態。因此，在述說希羽婚姻移民生命故事的同時，針對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婚姻移民女性生命經驗加以觀察以作為反思的參照，則有其積極的意義。

二、研究目的

本文的焦點在於關注希羽的英國婚姻移民生命經驗，但臺灣本地婚姻移民情形將以隱微的方式呈現作為參照反思之目的，藉以回應 Mills 觀察比較的主張。因此，本探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經由英國社會婚姻移民故事，來豐厚我們觀看臺灣新移民女性的視角。易言之，藉由 Mills 智慧與「人類學的陌生」的角度，本文以希羽婚姻移民英國的生命故事為主軸，藉由她在英國掙扎、奮鬥的生命歷程，幫助我們反思婚姻移民女性在臺灣的處境及浮現的多元文化素養議題。

貳、文獻探討

一、女性婚姻移民研究議題

近二十年來隨著女性主義與女權運動的萌芽以及全球化浪潮等歷史因素，探究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性別、婚姻、文化衝擊等議題逐漸受到關注（Beck-Gernsheim, 2007）。許多學者指出跨國婚姻移民研究，應該將性別、階級、年齡、世代、或區域等因素列為關鍵議題加以探究（例如，Chee, 2005; Kofman, Phizacklea, Raghuram, & Sales, 2000）。Hondagneu-Stelo（2003）即強調女性的移民研究文獻已逐漸以「性別」為主要探究議題，同時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檢視。Chee（2005）也建議需要有更多的文獻研究來探討相關跨國活動的優點、以及與週邊權力脈絡的微妙互動關係。事實上，婚姻移民女性一踏上異鄉，眼前就有亟待跨越的文化鴻溝、適應丈夫原生國的身分認同、以及符合公婆與社會規範等期待。這些文化衝擊的議題，尤其值得我們留意。例如，Imamura（1988）探究跨國婚姻移民至日本與奈及利亞的女性多重身分角色衝突現象，發現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女性身分」（womanhood）社會地位是女性主動參與社會建構而獲得的結果，而非客觀地被「賦予」（ascribed）的。因此，婚姻移民女性的社會地位是建構而來以及「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產物，不是與生俱來的本質可以隨著移民直接跨國轉移。婚姻移民女性從女兒到嫁為人婦，必需跨越兩種不同文化情境，也因兩種社會規範對「女性」定義顯著不同，她們經常面臨角色衝突的困境。「外配妻子沒有機會漸進式地融入當地社會，反而因為必需即刻與丈夫的原生社會建立關係，而面臨迫切的問題」（Imamura, 1988, p. 292）。Erel（2007）指出，有關婚姻移民的研究，有許多是從政策面向切入來滿足隱藏的政治性目的，婚姻移民女性的聲音與真實人生並非研究者關注的焦點。Erel（2007, 2009）以生命故事敘事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土耳其女性婚姻移民英國與德國的跨國生活歷程，尤其是爭取移民公民權過程中出現的階級、性別、文化與國籍等議題。在研究方法，此研究使用生命故事敘事架構可說是一種理論的「轉移」（shift），女性婚姻移民的聲音與自我表徵受到了重視，也挑戰了以往視婚姻移民為文化邊緣人、受害者或等待救援的苦命形象。觀諸歐洲有關婚姻移民女性的研究眾多（如，Beck-Gernsheim, 2007; Kofman et al., 2000），但是誠如上述英國內政部的研究顯示，可惜並無針對臺灣旅英移民女性生命故事的相關探究。

近年來在全球化經濟、與亞洲新興國家經濟起飛的脈絡下，「跨國家庭」（transnational families）的傳統模式已經逐漸改變。就北美洲而言，1970或80年代以前，許多是勞工背景的個案遠渡美國謀生，再將所得寄回原生國支持家庭經濟。全球化經濟的影響下，許多非勞工階級的女性的跨國活動現象也開始頻繁了起來。例如，Chee（2005）探究臺灣的中產階級女性個案因家庭經濟因

素，留下丈夫在臺灣賺錢，自己陪同小孩遠渡美國求學與生活，而形成「分離」(split)的跨國家庭案例。Chee的研究即是探索在全球化經濟的脈絡下，跨國家庭女性的性別、階級、族群、世代、婚姻移民、以及女性在扮演工作者、母親、妻子等身分認同的議題。其中，非勞工階級的女性的跨國活動探究，似乎也呼應了臺灣逐年增加的新移民女性，以及浮現的社會、文化或教育問題。

過去十年來有關「臺灣新移民女性」的研究議題上，初期有從跨國婚姻中政治與經濟的權力結構關係中來探究(如夏曉鶄, 2000, 2002, 2005)、接著有許多研究聚焦在新移民的子女教育適應或發展上(如吳青山, 2004; 吳毓瑩, 2005; 吳毓瑩、蔡振州、蕭如芬, 2010; 溫明麗, 2006; 張鈿富, 2006)、對子女教養觀念的調適(如陳美蓁, 2007)、或者是文化適應與認同議題上(如王美麗, 2009; 李玫臻, 2002; 邱碧珍, 2009)。綜而言之，探究女性婚姻移民議題，除了從鉅觀的政治、經濟或歷史因素構面(如王宏仁, 2001; 夏曉鶄, 2002)，從微觀層面來剖析複雜社會或文化影響因素也有增加的趨勢。例如新移民女性在家庭生活的文化適應上，可說是一切「重新開始」(李玫臻, 2002)或「從零開始」(娟舒結, 2006); 新移民女性的原生國與臺灣在生育或性別平等價值觀上有文化差異，而造成觀念上「文化衝擊」(蕭昭娟, 2000); 欲解決新移民女性在語言溝通、社經地位弱勢、或子女學習成就等困境，「文化因素」是其中的關鍵(王世英、溫明麗、羅天豪, 2007)。吳毓瑩等學者針對東南亞新移民母親的家長投入與子女學校生活適應的研究發現，新移民子女同儕關係不如本地主流孩子，原因是新移民子女面臨同儕不友善的對待，因此強調要提昇臺灣社會整體「多元文化素養」，而學校環境是一個起點(吳毓瑩等, 2010)。上述研究成果頗能提供我們對女性婚姻移民，深層而多面向的認識；尤其在文化相關的研究議題上，頗能導引我們反思臺灣多元文化教育的現況與缺失。然而就探究的方法而言，雖然文獻上有許多研究是以個案研究，或以生命故事的敘事角度，剖析女性因婚姻而移民的心路歷程與文化衝擊(如王美麗, 2009; 陳美蓁, 2007)。可惜並無研究是以跨文化的觀察與比較角度，從臺灣女兒出嫁國外而成為婚姻移民的生命故事，來協助我們反觀臺灣新移民女性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二、生命故事的建構及其意義

Denzin 強調：「自我或個人的故事從來都不是個別的產物，這些故事來自於個人所身處的團體、文化、意識型態、以及歷史的脈絡」(Denzin, 1989, p.73)。透過本研究的主角希羽，我們看到的不止是一位婚姻移民在英國的生命故事，同時也看到主角在英國文化及社會結構下所面對的文化歷史脈絡。然而，希羽的生命經驗是否反映了普遍的婚姻移民女性故事？Wolcott (1995) 主張任何個體一定在某些面向與其他人相同，也有某些面向和一部份人相似，當然也有某

些面向不像任何人。因此找尋可能的共通性例子或量化研究邏輯上所謂「代表性」並沒有必要，而且在實踐面上也有諸多困難，就本研究主題而言更是如此。Stake (1995) 在探討個案研究的藝術時即強調，不要問個案有沒有代表性，而要問「個案代表了什麼」。單一個案無法以量化邏輯從人口面向的隨機取樣來展現其代表性。此外，Wolcott 企圖以累積的概念來消解上述挑戰，認為「研究者必然面臨資源、時間等等的限制，由少數的個案開始慢慢地累加來完成一幅大拼圖，乃是研究者務實的作法」(Wolcott, 1995, p.171)。

Lieblich, Tuval-mashiach 和 Zilber 指出：「敘事以及生命史的取向已經在諸多學科取得地位，有人將這種現象視為社會科學界對實證主義拒斥的彰顯，並將此一現象名為敘事的革命」(1998, p.1)。在社會學界亦有所謂「傳記的轉折」(biographical turn)，在此轉折後個人敘事與經驗在社會學研究中的價值獲得了重視。人類學家藉著個別生命史去理解文化，呈現文化局內人的觀點，或藉著個別的生命故事去研究文化的變遷。Coffey (2001) 指出，個人的敘事乃同時建基於傳記性的經驗和社會脈絡之上，因此它可以產出有利於瞭解社會過程的社會學資料。Stanley 把這種看重個人敘事的趨勢稱為「社會結構的自傳化」以及「自傳的結構化」(Coffey, 2001, p.54)。易言之，結構與行動，個體與集體不宜過度二分。以傳記或生命故事來說，表面上好像只對焦在個人生命之上，但任何一本傳記，書中通常都充滿了傳主生命中重要他人的故事。因此，我們閱讀到的絕不止於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時代的反映。例如 Erel (2009) 在探究女性移民生命史時，指出生命故事敘事的研究方法：

不僅能看到發生什麼事，也能看出人們如何經歷、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這些事。因此生命故事的研究方法有利於探究主觀與社會結構間的聯結關係。(Erel, 2009, p. 5)

此外，傳記也具有創造性的個殊性活動(Inglis & Hughson, 2003)。以 Derrida 的詮釋則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other-in-self, self-in-other) (quoted in Sampson, 1989, p.16)。因此，傳記可說是社會學研究者瞭解社會過程的重要資料。就本探究而言，我們認真而嚴肅地看待生命故事的發展，並且在探究歷程中發掘不斷出現的事件來構成故事主軸線。本研究的生命故事研究方法，也為研究者提供契機來探究移民女性主體性與文化適應等議題。

參、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文第一與第二作者均留英求學，後續並多次返英從事學術研究。在徵求希羽同意參與本研究後，由第一作者於英國攻讀博士第二年起（2004 至 2007 年）、以及在英格蘭一所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期間（2008 年）進行資料蒐集，並延續至第一作者返臺任教，到最後一次資料蒐集時為 2012 年，前後時間約長達 8 年。資料蒐集方法主要以面對面正式訪談與電話訪談、以及非正式網際網路談話與電郵（如訪談日程紀錄）。非正式參與觀察資料則來自於第一作者平時與希羽家庭自然互動情境之下，撰寫之田野筆記。訪談對象以希羽為主，她的先生 Martin（匿名）為輔，訪談使用語言兼含中文及英文。至於希羽的兩個女兒（Arikiya 和 Karissa-匿名），因希羽站在保護女兒的立場，並未同意兩位女兒接受訪談。因此，兩個女兒資料的描述主要來自希羽的陳述、以及研究者的長期觀察為主。希羽家庭成員概況如表 1：

表 1 一家庭成員概況一覽表

姓名	年齡	人格特質	宗教信仰
希羽	50 初	個性執著、重家庭倫理關係、工作態度積極	篤信佛教
Martin	約 55	獨子，較寡言，喜愛運動健身、與自我進修	無
Arikiya	20	青春期中個性易怒，成年後已較穩定成熟	無
Karissa	18	值青春期中，愛美而喜愛與朋友外外交際活動	無

本研究資料處理分析方式以質性內容分析法，輔以非正式參與觀察及電郵文件分析。每次訪談結束後第一作者以重建稿方式電郵回臺灣，由第二作者閱讀訪談重建稿，進行初步分析並寫下需進一步追問、澄清的問題，再回傳給第一作者做為下一次訪談的參考，雙方偶而也越洋電話討論研究內容及進程。故事的撰寫由第一作者主筆，每完成一個段落則電郵回臺灣給第二作者進行檢視、修改、補充。兩位作者經常在書寫與再書寫的歷程中，不斷發現有待進一步瞭解的資訊而進行討論，因此這是一個接力的過程，也是對話的場域。在此動態歷程中作者格外能體會 Richardson 和 St. Pierre（2005）所言，書寫就是一種探究分析的歷程。

本研究進行了多次的電訪和面談，訪談時間集中於 2006 年（6 次），2008 到 2009 年因第一作者返回臺灣任教因而中斷正式訪談，然而其間仍透過網際網路持續性互動。最後一次正式訪談為 2011 年 9 月份，由第一作者再度造訪英國，與希羽面對面針對文本資料背後深層意義的澄清或廣續探索，相關訪談日程紀錄如表 2 所示。

表 2 訪談日程紀錄一覽表

次數	日期	資料蒐集	地點
1	2006 年 7 月 10 日	電話訪談	英國
2	2006 年 7 月 13 日	電話訪談	英國
3	2006 年 7 月 16 日	電話訪談	英國
4	2006 年 8 月 7 日	面訪	英國
5	2006 年 8 月 12 日	電話訪談	英國
6	2006 年 8 月 20 日	面訪	英國
7	2007 年 8 月 10 日	面訪	英國
8	2008 年至 2009 年	非正式網際網路互動	臺灣-英國
9	2010 年 11 月 23 日	電話續訪	臺灣-英國
10	2011 年 9 月 4 日	面訪	臺灣
11	2011 年至 2012 年 8 月	非正式網際網路互動	臺灣-英國

肆、希羽的故事：從臺灣的女兒到英國的媳婦

一、千里姻緣

希羽出生南部農村，在家中排行老二。父母親經營佛具行，父親工於佛像繪製，在經商外也招收徒弟習藝，鼎盛時期全家人數多達 40 餘人。以臺灣 60 年代經濟情況而言，希羽的社經背景是相當好的。希羽大學畢業後在臺北就業，1984 年在某語言中心認識來臺旅遊的英國男子 Martin。Martin 來自英國勞工家庭，16 歲離開學校，擁有相當於國內高職的學歷。19 歲進入軍中成為體能訓練師，在 1984 年離開軍中。Martin 當時 26 歲，以五個月時間旅行 27 個國家來增廣見聞，同年到達臺灣並且在臺北認識希羽。幾年後兩人因同住一個社區而熟稔，之後因機緣巧合合租同一公寓，交往更加密切，最後決定攜手共同走人生的路。

1991 年，兩人計劃公證結婚步上紅毯。但仍需事先拜會希羽父母徵求同意。當希羽帶 Martin 回南部拜訪父母時，正值盛暑，但午宴中的 Martin 因穿著長袖襯衫而滿頭大汗。敵不過老人家殷殷關注，他緩緩捲起了襯衫袖子，白皙的手臂上露出「刺青」，兩老臉色頓時大變，忍不住詢問並斥責一番。幸好希羽的家族已有多次和非閩南族群通婚的經驗，老人家對異文化的接受度頗高。刺青事件經過希羽向長輩解釋，說明英國人刺青是流行藝術與個人風格，並非反社會行為。雖然過程曲折，但 Martin 終究獲得希羽雙親的接納。兩人是年於臺北公證結婚，大女兒 Arikia 和二女兒 Karissa 分別於 1992 年與 1995 年出生。

1998年，希羽一家返英探親，順道參觀幾所英國小學以比較臺灣和英國小學教育的差異。Martin 因考慮回英國照料年邁父母，加上同年 Arikia 上臺灣小學一年級，無法適應學校過多功課，以及當年腸病毒肆虐，人心惶惶。在種種因素下，促使他們決心收拾行囊返英。1998年冬至當天，希羽踏上婚姻移民之路。對希羽而言這一行是離鄉也是返鄉，就華人的傳統觀念來看，在父權的社會體制下，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既然嫁給了英國人，當然這一趟是回家的路；但就情感層面來看，離開多年生長的土地、離開父母家人，離鄉的情懷是難免的。但不管是離鄉、或是返鄉，從社會面向來看，婚姻移民女性在英國必需面臨的問題，正等待希羽一一去面對。

二、為五斗米折腰

剛回到英國，希羽在家中照顧年幼未就學的二女兒，大女兒則進入小二就讀。返英初期她倍嘗「舉目無親」的孤寂，尤其到了傳統中國節慶，總有一股「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鄉愁湧上心頭。1999年9月，二女兒滿四歲進入公立幼兒學校（Infant School），希羽開始積極外出找工作。一方面為家計、另一方面則希望透過就業早日融入當地文化。希羽從兼差園藝工到房舍清潔工，這些彈性的工作時間，讓她能兼顧照護小女兒只有半天的上學時間。過去希羽在臺灣工作多屬「領導」層級的職業，來到英國卻只能從事「女工」性質的工作，這種轉變讓她感到挫折和無奈。然而清潔工能進入英國當地房舍，倒讓她對當地環境和英式家庭生活有進一步的瞭解，提供她自然融入當地生活的機會。

2002年初，希羽因認識移居英國的菲裔女子 Nancy，而開啟了下一份工作的契機。Nancy 的英籍丈夫在倫敦南方 Gatwick 機場擔任空廚副總，兩家很快熟識。希羽得知機場空廚招收員工的訊息，因此前往應徵。她對面試經理只關注應徵者工作能力和態度的公平與人道精神印象深刻，希羽也終於靠自己表現掙得工作機會。為了配合 Martin 工作，希羽選擇大夜班（晚間 10 點到次日清晨 6 點）。從此，希羽清晨下班後需料理先生與小孩上學，利用白天睡到下午孩子放學時間（約 3 點半），接完小孩放學與料理晚餐後，再開車上夜班。因睡眠不足與作息反常，在開車途中時而精神不濟。但每日回程返家路上，美麗的清晨景緻總讓她一天的疲倦拋諸雲霄，至今仍令她回味無窮。

在工作上，希羽的專注和敏捷很快讓她從組合經濟餐點晉升到商務和頭等艙的餐點料理工作，並且很快晉升為小組長。然而 2002 年美國的 911 事件，讓希羽成了間接受害者。911 後航空界一片蕭條，關閉和裁員的航空公司此起彼落。公司在當年耶誕節前裁減所有臨時員工，只差一個月就可以成為正式員工的希羽，也在裁員名單中。2003 年 1 月，希羽前往住家附近的國際貨幣處理

專論

公司應徵夜班作業員，因需要具備良好數學能力，她在面試後馬上取得工作機會。工作主要是分類、計算一袋袋混雜的各國銅幣。希羽埋頭苦幹的工作態度，引起愛聊天閑談的部分亞裔女同事不滿。背後告希羽不合群，她還因此被老闆約談過幾次，詢問是否跟同事有過節，她回憶道：

因自己習慣在工作上專心工作，「不愛聊天」...我屬於比較「嚴肅型」，也就讓人感到無趣...腦子老是要想一些如何以何種有趣又帶些詼諧字語回答，這就不是我可以隨時應變得當...時間久了他們也不太願意與我溝通，當然我還是有一些同事可以交談，因他們不是同類。

希羽陳述自己不喜歡加入閑聊的行列，覺得上班不應太隨便，無形中影響了自己的人際關係。幸好老闆明理，後來這群人幾乎都在公司裁員時捲鋪蓋走路了。

同年 11 月希羽因子宮切除手術向公司申請法定長假；次年 3 月返回工作崗位，但是剛離開醫院的希羽尚不能提重物，同事們多能體恤，唯獨領班的女組長毫不憐憫，要求希羽需自行提錢袋往返工作臺間。希羽因此決心請調至白天班，脫離不人道待遇，並期盼恢復正常作息以調養身體。她終於在 2004 年 6 月如願，結束多年晨昏顛倒的日子，這在希羽婚姻移民的奮鬥歷程上具有相當的意涵。因為調到白天班後，作息恢復正常，連工作所需的語言溝通也增加了，希羽的語言能力以及和同事互動狀況漸入佳境。

希羽擁有大學學歷，而且精明幹練，但是在一個語言、風俗不同的國度只好委屈從事低階的工作。在臺灣她經營美語補習班、擔任出版社編輯等，都是中產階級的工作；但是甫至英國時卻得從事清潔工等低階勞力的職業。2000 年希羽年邁的父母在家人陪同下，專程探視遠嫁英國的女兒。兩老親自造訪後，「清潔工」乙事終於曝光。她的父母從生氣、驚訝、繼而難過掉淚，但終得接受現實。希羽知道父母不捨，無奈這是身不由己的抉擇。

三、文化混血與文化衝突

在婚姻移民面臨的諸多文化衝擊中，希羽幸運地沒有與公婆同住而無婆媳緊張關係的難題。希羽公婆住老人公寓，親人可定期前往拜訪。其次，與丈夫相處上，依據第一作者多年非正式觀察，Martin 不沾菸酒，平日喜愛健身與慢跑、亦熱中自我進修。因此，行為上他是屬於上進、無不良嗜好的好丈夫。然而因為是家中獨子、加上英國社會結構下較傾向個人主義，Martin 在家中主動與家人深度互動的時間不多，大多是口頭幽默式的寒暄。在希羽主觀感受上覺得 Martin 應該扮演更積極的丈夫與父親角色。希羽曾抱怨從未有機會和老公傍

晚一起到戶外散散步，她感慨地說：「Martin 未曾假日主動安排家庭出遊，但常常自己安排到其他國家，如義大利、泰國旅遊或兼差教英語」。夫妻對教養態度、方式因文化背景差異亦很難取得共識。

然而，最大的挑戰應該是希羽與女兒間的文化鴻溝。Arikia 在青春期後，和母親衝突日益升高，她總覺得母親不懂她們的文化。希羽以華人倫理道德觀要求孩子品行，例如要求女兒洗碗、整理房間等，但母女屢屢爭執不休。主要是 Arikia 覺得同學並沒有像她一樣要做家事，她覺得房間是隱私空間，個人行為不應該被「論斷」(judge)。此外，家中語言使用的不同也是一個衝突點，例如，希羽覺得 Arikia 說話語氣不夠尊重父母，讓從小接受儒教薰陶的她很難接受。Arikia 情緒容易失控，導致她經常以流利的英文粗話咒罵母親，同時也經常嘲諷母親的中文英語。雖然有時可看出她對母親的關愛，但母女大多處於水火不容的敵對狀態。固然教養技巧、策略也許是希羽需學習加強的面向，但親子間的文化差異成為教養衝突的癥結。希羽在英國社會脈絡下用不同於西方的東方道德尺度與西方主流文化抗衡，結果傷痕累累。表象上似乎是教養方式的掙扎使母女間充斥著衝突，但背後卻是東西文化的差異和拉鋸。

此外，經濟壓力也是衝突的催化劑。希羽甫返英時家計並不穩定，孩子難有生活上的奢求。但來自學校同儕次文化使得孩子在物質上有相對的期待，希羽為經濟所做的考量和禁令都成為孩子情緒狂飆的引爆點。Martin 在 Arikia 青春以前較少協助教養小孩，他採取尊重孩子的模式，也常自外於母女間的衝突。處於青春期的 Arikia 曾出現過兩次輕微自殘的行為，有一次賭氣在父母面前割腕，但及時被制止。另一次則是與母親爭搶刀刃而刺傷大腿，因醫護人員誤認為是母親蓄意傷害，Arikia 差點被隔離原生家庭而接受社工單位監管。據第一作者觀察與希羽的描述，Martin 因為在家中較缺乏主動與家人互動溝通，以及在西方文化薰陶下較重視個人生活空間、與尊重小孩順性發展的態度，讓夫妻教養態度因文化背景差異而難取得共識。但是經過 Arikia 的自殘行為，希羽透露 Martin 已願意逐漸和她一同去面對孩子的問題，Martin 也計畫未來主動利用假日安排家庭出遊，甚至不排除到其他國家旅遊。至於希羽，她對於英國青少年文化，雖然不認同，卻有更多的認知與調適。她說道：

小孩的成長過程也讓自己了解，自己過去的慣性...畢竟各種種族生活文化背景與社會結構是不同...要融入當地社會族群，就必須放下自己的先見，然後再調整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他們的文化，生活習慣注重個人空間、尊重小孩的抉擇、也同時給小孩足夠空間去探索、尋找與滿足他們想要的一切好奇心。(2011年9月，英國)

誠如Imamura (1988) 所說，婚姻移民女性跨越了兩種不同文化情境時，將因不同文化下對「女性」定義的差異而產生角色衝突。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婚姻移民女性如果本能地遵循原生國母親的教養方式，在文化情境迥異的移民社會中可能招來丈夫、公婆、朋友、甚至子女的批評或歧視。事實上，在訪談中，Martin提到，英國的孩子們（包含他自己）「都是在尊重包容中長大，青春期的叛逆是很正常的...到了成熟的年齡，自然會恢復到常軌（normal）」。希羽省思到「自己過去的慣性」是權威式的東方教養方式，用在西方孩子身上就產生了衝突。因此，她逐漸學習Martin採取尊重孩子的模式，「放下自己的先見」而去「尊重小孩的抉擇」，這份改變與文化涵化的調適過程可說是得來不易。

四、管窺英國社會多元文化素養

誠如 Wolcott (1995) 所言，個案本身永遠是特殊的（particular），惟它的寓意卻可以是深遠的。Arikiya 和 Karissa 姐妹的學校生活以及希羽的每日文化體驗，可以提供我們初略觀察英國多元文化素養的概況。

(一)英國學校裡的多元文化素養

Arikiya 進入小學二年級就讀時，曾被同學譏為「Chinese」，嘲弄她的中式便當，故意找她麻煩，例如刻意推她一把等。這種狀況持續一段時間。在被欺負的情況下，站出來支持、拉攏她的是一些品行較差而且在班級中也受到排斥的同學。希羽發現 Arikiya 逐漸出口成「髒」，便是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耳濡目染來的。Arikiya 初返英國後，生硬的英語溝通能力，以及同學的嘲弄的確帶給她相當的折磨。希羽和 Martin 向學校反應後，校方找來欺負人的孩子進行個別輔導，而老師也針對 Arikiya 遭遇的同儕接納問題，設計課程進行文化認識的教學。因此，Arikiya 被凌霸（bully）的狀況顯著減少，但並非從此天下太平。

就英國本地人的眼光來看，Arikiya 外觀上的混血特徵是清楚的。進入中學之後，Arikiya 因為一開始就和同儕一起進入學校，沒有聽到她再提起被歧視的問題。反倒有許多同學羨慕她混血的健康膚色和中文能力。相對於姊姊，Karissa 返英後在文化適應上幾乎和當地小孩一樣，沒有對她的學習產生負面衝擊。在與第一作者閒談中，Karissa 透露自己以擁有一半中國人（臺灣人）血統為傲，尤其得意的是她能運用中、英兩種語言。唯一的不愉快是發生在小學六年級時，當時班上流行小男朋友的暱稱，有一次 Karissa 被小男朋友甩了，還被那位小男友賞了一句不堪入耳的髒話（Chinese bitch）。另一位居住英國同樣來自臺灣的婚姻移民女性朋友，談到此事時認為，這個事件反映了少數英國小孩隱性歧視態度，只有在衝突發生時才會被激發，而且通常與父母多元文化素養有關。

Arikiya 的遭遇雖然只是個案，但是她的故事仍深具啟發性。從 Arikiya 的經

驗我們看到她就讀的小學已經坦然面對多元文化衝突議題、以及校園凌霸的問題。但似乎仍停留在回應、被動式的問題解決模式。雖然從英國官方教師電台（Teachers T.V.）中，隨時可見相當積極的多元文化教學型態，但可惜電台中所呈現標榜的專業表現，未必能真正落實在全英國小學校園裡。就本探究而言，Ariki 過去所就讀小學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似乎有待提升。這些差異對照提醒我們，多元文化教育的進行必需超越表象，去面對更深沉、內在、潛隱的態度。

（二）英國社會的多元文化素養

希羽旅居英國的每日文化體驗，也可以提供我們初略觀察英國多元文化素養的概況。希羽在 Karissa 上學後，開始尋找全職工作。首先，她到住家附近服飾店應徵。希羽表明求職動機在於分擔家計並適應文化，但店主以希羽擁有大學學歷，而且經歷都是文化工作為由拒絕了。希羽從店主輕蔑的語氣中感受到被歧視。服飾店求職經歷嚴重打擊希羽信心，她感慨認為：「為求生存而謀正當職業，豈容論尊卑？」因此，索性當起清潔工。在這個轉折中我們看到人的自我認同與脈絡的互動關係，此時希羽的脈絡，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希羽進入清潔公司不久，就憑她認真態度逐漸贏得好評並成為重要客戶的指定工。當然，在清潔行業中，難免也遇到少數以歧視眼光待人的雇主，雖令人不悅，但為了生計也只能忍耐。

最令希羽氣憤的歧視事件，發生在 2003 年。這一天，她開車載兩個女兒去購物，回程在購物中心停車場準備離開時，角落出現幾個當地青少年，他們嘴裡唸唸有詞並對準希羽的擋風玻璃丟煙蒂。希羽覺得他們是有意羞辱，顧不得後面跟著數輛排隊的車子，她下車請年輕人撿起煙蒂。這群人嘻哈不理，但希羽堅定地再次要求，終於有人撿了起來。希羽回到車上正要開車時，又有煙蒂飛來。頓時希羽被惹火，再次下車和這群年輕人理論，並撿起煙蒂往他們身上丟去。此時一位男生飛撲過來，希羽以雙手反擊，另一位女生也撲過來扯下希羽的眼鏡，在混亂中又有數位年輕人加入扭打成一團。在希羽車後的英國人在沉默觀戰後，終於看不下去，一對夫妻下車吆喝這群青少年：「你們真是丟盡英國人的臉！」這群人中有人應聲道：「我們是孩子，她在欺負我們呢！」這對夫妻回應說：「還不快走，你們真是丟我們的臉！」希羽理了一下身上皺褶的衣服，回到車上，顧不得兩個受到驚嚇的女兒，眼淚一發不可收拾。就這麼一路哭著把車開回家，胃也痛了一整晚。但她還是忍痛去上大夜班，後來因情緒實在難以平復，只好告假回家。為此公司組長還向老闆告狀說希羽不盡責，所幸在約談後老闆體恤她的遭遇，沒有再發生不愉快的事。

從多元文化的視角切入，希羽數年來在英國的生活遭遇，有許多正向而令人振奮的經驗，但是不愉快經驗亦屢見不鮮。所幸希羽認為她保持平常心的人

生哲學與佛教信仰是她在困境中的支柱，她還開導一位經常怨天尤人的東方婚姻移民朋友說：「...任何工作都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尤其是來自東方的婚姻移民，遇到時別刻意對號入座，心中自有尺度即可，畢竟身在異鄉，語言、學經歷的隔閡是必然的」。

五、鷹架：跨文化的參照觀察

希羽婚姻移民後，面臨家庭內外文化的衝擊，她來自家鄉的人生哲學與佛教信仰則鷹架了她在英國生命的成長。此外，家庭夥伴的支助也是一項重要的鷹架，包含夫妻間逐步改善的溝通模式（雖然過程艱辛）。此時，令人好奇的是，英國社會脈絡下有哪些文化資源可以鷹架婚姻移民女性的成長。首先是各郡（Council）的成人教育中心每年辦理各種成人教育課程，通常是免費或只需少許報名費用，如ESOL（*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英語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居住滿三年以上居民每學期只需繳 6 英鎊，並且大多附設免費托兒服務。另外中心也教授電腦、手工藝和各類成長團體，這些課程是方便外籍移民的實用學習管道。雖然中心課程並非專門為婚姻移民女性開設，但她們往往是直接受益者。就希羽而言，生活的忙碌讓她無暇參與自我成長學習活動；除了照顧孩子，女性的身分也讓她在家務負擔相對沉重，而限制了初期希羽利用在地社會資源來鷹架自己成長的機會。

從跨文化的觀察角度，我們也好奇是否可以從臺灣新移民女性的身上，看到臺灣社會提供了何種文化資源來協助新移民女性的成長。例如，來自印尼的黃莉莉在南洋臺灣姊妹會的「生命史」課程中，找到宣洩管道並積極改寫自己的生命故事。她說：

上過「生命史」的課，讓我自己改變了很多...當我們把故事寫清楚，像寫日記那樣通通寫出來，很輕鬆，就好像是把心裏的一塊大石頭放下來...發現原來我的痛苦也沒什麼了不起。（黃莉莉，2006，頁 46）

生命史的課程是黃莉莉的鷹架，這個課程讓她有機會改寫她自己的傳記。看到這位臺灣媳婦的自我認同與經歷正向的再建構，希羽移民初期無暇參與英國社區自我成長學習活動，是令人惋惜的。希羽感受被歧視的經驗讓我們回顧另一位來自越南，在臺灣已經居住十年的新移民女性說：

我去夜校開始上課時卻遇到許多不太好的經驗...剛開始臺灣人可能還不太能接受外籍移民，會用另類的眼光看我們，認為我們是來騙色騙吃騙喝，所以態度往往都很冷淡。（林金蕙，2006，頁 42）

臺灣人相似的異樣眼光也常落在新移民女性孩子身上，猶如希羽兩個女兒在英國的際遇。這些「新臺灣之子」的學校經驗正如張明慧筆下新臺灣之子的感觸：「有一次學校調查誰的媽媽是外籍新娘時，只有我舉手，從此班上男生常會用很難聽的話來笑我。他們說我的媽媽很賤，就是愛臺灣的錢才會嫁到臺灣來」（張明慧，2005，頁 211）。就像希羽，嫁來臺灣的新移民女性也面臨雙重壓力，正如一位新移民媽媽的憂慮，「當孩子慢慢長大，我的擔心也愈來愈多...怕孩子像其它新移民女性的孩子上學被同學排斥」（林金惠，2005）。

英國婚姻移民的女性無論在文化、社會情境脈絡等方面均與臺灣「新移民」女性截然不同，因此我們無意進行直接比較。但是這份跨文化的觀察應該有助於我們以新的角度挑戰視為「理所當然」的慣性思維。我們在心疼臺灣女兒嫁到異國後可能面臨的困境之餘，對於臺灣的婚姻移民女性是否也可以將心比心來理解他們的困境？這個挑戰可說是未來臺灣社會多元文化素養的重要指標。

伍、故事背後的紋理及啟示

一、雙贏-在說故事中成長

我們在說故事中反思，藉著重新說出更美好的故事而成長。藉由這一個探究，我們體驗到一個非常不同於自身的生命故事。這個生命故事讓我們看到希羽遠嫁異國的辛酸。希羽付出了時間、精力分享她自己的故事，她的成長、改變又是什麼呢？回味返英時掙扎於工作的感受，希羽表示：「真的很辛苦」。雖然現狀仍不是她理想中的標準，但已經有「苦盡甘來」的滋味。在最近一次的訪談中，希羽回首在英國 14 年來的文化衝突與成長，從對英國風俗全然陌生到現在的學習中成長，她感嘆地說：

來英國不僅是從朋友中、工作中、同時也在家庭中與小孩一起成長...我們只能傳述我們的經驗，但不是強迫讓他們接受。抉擇是他們，我們不能為她決定，這就是我學到的尊重。在他鄉工作，許多事與物都必須先將原本帶自己國家的習性放下，去瞭解他國的文化習性...還有放下身段虛心學習是會贏得無法想像的豐收經驗。（2011 年 9 月，英國）

希羽把先生事業與子女教育擺在個人利益之上，返英前五年她為了家計而放棄進修學習的機會。在這一個生命故事訪談的催化，加上先生工作的穩定、兩個女兒都進入中學的因素下，她已經決定利用英國社會資源進修成長。回顧自己婚姻移民來時路，希羽把生命進程分為四個時期：混亂摸索、穩定尋求、

穩定求發展、以及成長與展望期（如附錄），她很期待自己在成長與展望階段能發展出不同的生命劇碼。

這一個生命故事的撰寫對兩位研究者而言，無疑是珍貴的教育經驗。正如郭佩宜和王宏仁（2006，頁 i）所強調：「田野工作轉化研究者對知識、世界和自我的認識，因此田野工作是自我追尋與成長的歷程」。從社會建構的角度，自我的經驗與他人處於不斷互動的狀態。藉由他人的故事，我們可以得到不斷自我創造的能量（吳麗君，2006）。相同的，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愈能瞭解他人就愈能認識自己。接觸不同的人即是幫助我們去改變與成長的方法（江雪齡，1996）。兩位研究者透過研究歷程中的自我反思與成長可說是豐富的。首先，就從事研究工作而言，這份田野工作主要收穫，在於我們以「參與式觀察」長期關懷希羽旅英婚姻移民的歷程。其中第一作者透過與個案家庭的頻繁互動，兩位研究者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對新移民女性處境的同理心滋養，可說是隨著研究的進行而逐漸增長。研究者的自我經驗與希羽的生命故事因為處於不斷的互動狀態，田野工作中有了共同成長的歷程。這個經驗正如 Stanley（1992）所說的，生命故事或生命本身因成為一種「知識類型」（epistemological category），而為研究過程中的研究者與參與研究者「相互主體」（inter-subjectivity）之間帶來特殊的影響。

二、反思臺灣多元文化教育

從 Mills 的《社會學的想像》來觀照，要瞭解個人的一生不能不瞭解其所身處的社會。述說希羽的故事並概略反思臺灣新移民女性的生命經驗，我們更清楚看到社會脈絡對於個人生命的形塑。在希羽的故事中，我們看到女性追尋的婚姻夢想與生活現實之間的落差。尤其異國婚姻的挑戰，常常因著當地歷史、社會與文化脈絡的特殊性與新移民女性婚姻歷程共同交織，可能建構出讓希羽或臺灣新移民女性當初始料未及的生命經驗。以英國的社會脈絡而言，生活在重視社會福利與人權的英國，希羽要跨越的門檻多是屬於家庭「圍牆內」的子女教育、語言文化衝突與調適。英國的種族歧視固然存在，但根據希羽 14 年的英國生活體驗，她認為表面結構上英國公民的多元文化素養或多或少受到人權至上的文化導引，民眾在外顯語言行為上至少是相互尊重的。至於臺灣，希羽覺得：「臺灣傳媒習慣用菲傭、印傭等說法，傳達的就是歧視的訊息」。因此，遠嫁臺灣的婚姻移民女性要跨越的門檻，可能不只是「圍牆內」可能的暴力、歧視、婆媳糾結等，還得面對家庭「圍牆外」缺乏多元文化素養的歧視。誠如張仲璇（2007，頁 23）所言：「移民牽涉到階級地位，也牽涉到階級流動的問題。無一技之長、無恆產無動產的移民，移到了新的地方就變成底層階級（underclass）」。在臺灣，許多新移民女性嫁入社經地位弱勢的男方家庭。民眾在看待新移民女性時，很難不看到她們的底層階級地位。加上官方、以及一般

民眾，容易將「外籍新娘」污名化，把她們與「假結婚、真賣淫」畫上等號（夏曉鵬，2002）。

譚光鼎（2001）強調，國人在面對外籍婚姻移民女性時，族群偏見與歧視的心態便隱然若現，經常以「同化」的思維強調外籍配偶必需學習適應、與融入臺灣社會中，反而未設身處地的去反思看待她們的方式是否有待改善，因此當前改善之道就是實行「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黃政傑與張嘉育（1998）也批判指出，近年來從不斷增加的跨國婚姻移民現象觀之，臺灣正面臨族群關係緊張的新挑戰，能導引社會和諧發展的最佳方案即是實行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是源於 70 年代以後許多西方主要國家為達到社會的公平正義，所要落實的重要教育政策與行動方案（黃政傑、張嘉育，1998；Banks, 1995）。然而今日的臺灣社會，因應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缺乏包容與接納跨國婚姻移民女性的多元文化素養現況，這份多元文化素養的培育與滋養，不但要從學校多元文化教育著手、也需要從改變社會結構面向來落實臺灣多元文化教育，透過文化涵化的歷程來改變社會風俗。我們期待藉著希羽的生命故事，對臺灣社會結構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也期許這份跨文化的觀察與省思能協助我們以多元文化教育來滋養「同理心」，將心比心為新移民女性建構一個能接納的社會氛圍。

綜言之，誠如 Stake（1995）強調在探討個案研究時，不要問個案有沒有代表性，而要問「個案代表了什麼」。本研究描繪希羽豐富但曲折的生命故事，我們看到個案在臺灣接受過高等教育，為了婚姻兒女而移民英國，在英國遭逢來自經濟、文化等等的挫折與困頓。雖然也有臺灣女性嫁入英國後，可能在文化、就業、家庭各方面是一帆風順的，我們接受 Stake（1995）的說法，不去探討個案有沒有代表性的問題，但是從質性研究個案選擇的規準來看，希羽的生命故事肯定是個具有豐富學習機會的個案。其次，生命故事的探究在時間上跨越了現在與過去，在研究方法論上提供我們理解個體微觀層級與社會、文化與歷史等鉅觀層級如何交錯聯結的契機。故事本身的血肉所具有的生命力及歷史厚度讓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多了一種選擇的可能。最後，生命故事的探究也是一種研究者與參與研究者雙贏的事業。藉由生命故事的深耕可以同時成就認知與自我成長；藉由希羽的故事，研究者與參與研究者雙方都得到不斷自我創造的能量。

參考文獻

王世英、溫明麗、羅天豪（2007）。臺灣人口結構變遷之外籍配偶子女補救教學模式建構。*教育資料與研究*，74，73-96。

專論

- 王美麗（2009）。澎湖縣越南新移民女性文化調適之個案研究。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
- 王宏仁（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1，99-127。
- 內政部統計處（2008）。九十七年第三週內政統計通報（96年國人結婚之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統計）。**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取自 <http://www.moi.gov.tw/stat/>
- 內政部統計處（2010）。九十九年第三十二週內政統計通報（99年上半年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統計）。**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取自 <http://www.moi.gov.tw/stat/>
- 江雪齡（1996）。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多元文化教育。臺北：師大書苑。
- 李玫臻（2002）。外籍新娘的社會網絡與生活適應—民雄鄉的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嘉義。
- 吳青山（2004）。外籍新娘子女教育問題及其因應策略。**師友**，441，6-12。
- 吳毓瑩（2005）。回訪春天—新移民女性的學校參與之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學生輔導**，97，28-37。
- 吳毓瑩、蔡振州、蕭如芬（2010）。東南亞裔新移民母親之家長參與及與子女學校生活適應之關聯。**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4），157-186。
- 吳麗君（2006）。從一位學者的生命故事看英國中小學的文化。載於吳武典、高強華主編，**優質，創新與前瞻—郭為藩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輯**（頁461-500）。臺北：學富。
- 林金惠（2005）。我的孩子並不笨。載於夏曉鶯主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72-75）。新北市：左岸。
- 林金蕙（2006）。學習中文，進步的動力（江家華採訪）。載於誠品書局主編，**誠品好讀 65集·新移民，初體驗**（頁42）。臺北：誠品。
- 邱碧珍（2009）。臺灣新移民女性認同歷程之研究—以原生國為越南籍婚姻移民女性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教育學系，臺北。

- 夏曉鶯（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 夏曉鶯（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叢刊。
- 夏曉鶯（2005）。尋找光明-從「識字班」通往行政院的山徑路。載於夏曉鶯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 12-47）。新北市：左岸。
- 教育部（2013）。**101 年度世界各主要國家之我留學生人數統計表**。取自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2204&Page=18230&Index=4&WID=409cab38-69fe-4a61-ad3a-5d32a88deb5d>
- 娟舒結（2006）。教育也有文化差異（趙慶華採訪）。載於誠品書局主編，**誠品好讀 65 集—新移民，初體驗**（頁 48）。臺北：誠品。
- 郭佩宜、王宏仁（2006）。導論：非關田野，非關技藝。載於郭佩宜，王宏仁主編，**田野的技藝**（頁 i-xix）。臺北：巨流。
- 陳美蓁（2007）。**跨文化中教養之經驗與調適歷程—一位印尼籍配偶的敘說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所，臺北。
- 張仲琬（2007）。**婚姻移民的行動邏輯：一位「越南新娘」的個案重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世新大學新聞系，臺北。
- 張君玫、劉鈞佑譯（1995）。**社會學的想像**（C. W. Mills 原著，1959 出版）。臺北：巨流。
- 張明慧（2005）。發展與多元—談新臺灣之子發展與新移民女性。載於夏曉鶯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 206-215）。新北市：左岸。
- 張鈿富（2006）。外籍配偶子女教育問題與因應策略。**教育研究月刊**，**141**。取自 <http://www.edujournal.com.tw/menu/141/index.shtml#>
- 黃政傑、張嘉育（1998）。多元文化教育的問題與展望。**教育研究資訊**，**6**（4），69-81。
- 溫明麗（2006）。我國新移民子女學習成就現況之研究。**教育資料與研究**，**68**，137-170。
- 蕭昭娟（2000）。**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臺北。

譚光鼎 (2001)。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教育。載於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慧編著，**多元文化教育** (頁 113-135)。臺北：國立空大。

Achato, L., Eaton, M., & Jones, C. (2013). *The migrant journey: Third report*. London: Home Office.

Banks, J. A. (Ed.). (1995).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New York, NY: Macmillan.

Beck-Gernsheim, E. (2007). Transnational lives,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migrant communities in Europe. *Global Networks*, 7(3), 271-288.

Chee, M. W. L. (2005). *Taiwa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omen and kin work*. New York, NY: Routledge.

Coffey, A. (2001).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Delamont, S., & Atkinson, P. (1995). *Fighting familiarity –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ethnography*. Cresskill, NJ: Hampton.

Denzin, N. K. (1989). *Interpretive bi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Erel, U. (2007). Constructing meaningful lives: Biographical methods in research on migrant women.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2(4), 5. Retrieved from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2/4/5.html>

Erel, U. (2009). *Migrant women transforming citizenship: Life stories from Britain and Germany*. Aldershot, UK: Ashgate.

Hondagneu-Stelo, P. (2003). Gender and immigra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introduction. In P. Hondagneu-Stelo (Ed.), *Gender and U.S. immigration: Contemporary trends* (pp. 3-19).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mamura, A. E. (1988). The loss that has no name: Social womanhood of foreign wives. *Gender & Society*, 2(3), 291-307.

Inglis, D., & Hughson, J. (2003). *Confronting culture – Sociological vistas*.

Cambridge: Polity.

- Kim, B. (2011). Asian female and Caucasian male couples: Exploring the attraction. *Pastoral Psychol*, 60, 233-244.
- Kofman, E., Phizacklea, A., Raghuram, P., & Sales, R. (200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urope: Employment, welfar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Sage.
- Merali, N. (2008).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studying female marriage migra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2, 281-289.
- Richardson, L., & St. Pierre, E. A. (2005).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959-978). Thousand Oaks: Sage.
- Sampson, E. E. (1989).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In J. Shotter & K. J. Gergen (Eds.), *Texts of identity* (pp. 1-19). London: Sage.
- Stake, R. E.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London: Sage.
- Stanley, L. (1992). *The auto/biograph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eminist auto/biograph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Wolcott, H. F. (1995).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education. In R. M. Jaeger (Ed.),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327-359). Washington: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附錄

一、希羽生命故事中的重要記事

- 1984年 在臺北認識英國人 Martin。
- 1991年 與 Martin 結婚，並定居臺北。
- 1992年 大女兒在高雄出生。
- 1995年 二女兒在臺北出生。
- 1998年 一家四口返英探親，當年冬至全家返英定居。
- 1999年 首度在英國外出工作，擔任部分時間的花園園藝栽培臨時工。年底進入清潔公司，任全職清潔工。
- 2002年 在國際機場空廚工作，任大夜班。
- 2003年 進入現職貨幣處理公司，初任夜班，於 2004 年轉白天班。
- 2004年 利用晚間閒暇時間，進修電腦桌面設計課程。
- 2005年 結合在臺灣的編輯專長，進修基礎網頁設計課程。
- 2006年 參加英語進修課程以減少與家人衝突時間。希羽雖願意以開放心胸看待英國青少年次文化（如飲酒、夜歸等），儒家道德觀仍是她與大女兒經常衝突的引爆點。
- 2007年 六月獲成人英語檢定初級證書。因夫妻教養觀點不合與親子關係衝突日劇，夫妻共同諮詢心理顧問，雙方願意轉移生活重心增進夫妻感情。
- 2008年 進修夜間會計初級課程以轉移生活重心，並提升在公司會計工作能力。九月大女兒進入學院，Martin 開始攻讀博士，同時給予希羽更多支持與參與子女教養與溝通。
- 2009年 繼續進修會計課程，並接連獲得會計初級證書與二級證書，同時獲得公司支持參加 Excel 課程。
- 2010年 由於不斷進修與努力來提升自己的實力，終於得到公司肯定與信任，目前已成為公司重要職員。
- 2011-12年 希羽工作持續穩定，在小女兒 Karissa 進入青春期後，親子關係緊繃，希羽試圖自我調整避免重蹈過去與大女兒衝突的循環。

二、希羽遠嫁異國後生命故事的四個階段

希羽在主觀上將自己返英後的日子分四個階段，每個階段約三年：

- 1、**混亂的摸索期：** 1998 至 2001，生活在摸索和奮鬥之中，一切都很混亂，一切處於走一步算一步的狀態。
- 2、**穩定尋求期：** 2001 至 2004，工作已逐步適應，生活步調也漸趨穩定。

- 3、**穩定求發展期：** 2004 至 2007，孩子陸續進入中學而漸能自主，Martin 也完成碩士學業。她深信生活會有不同的階段性呈現。
- 4、**成長與展望：** 2007 至今，Martin 攻讀博士，她也繼續進修英語和會計，雖然有夫妻教養觀點不合與親子衝突等問題，她對未來仍有殷切期待。

The Life Story of a Taiwanese Female Intermarriage Migrant and Its Implications

Wen-Chuan Lin^{*} Li-Juing Wu^{}**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ife story of Xiyu, a Taiwanese girl who married a British man and later migrated to England. This emic view of a Taiwanese girl's intermarriage migration sheds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issues that female intermarriage migrants have struggled within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aiwan.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examining the life story is a "win-win" move involving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growth for both researchers and the researched as beneficiaries. Then, from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Xiyu's story helps us to view the issues that might-have-been-taken-for-granted pertaining to the cultural conflicts and accommodation of the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This life story cuts across time and space beyond the individual can plane. It makes a close link possible to the emic life and an educational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lso shed light on the issue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regarding the female intermarriage migration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aiwanese.

Keywords: intermarriage migration, life story,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 Corresponding Author: Wen-Chuan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English Department,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Li-Juing W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